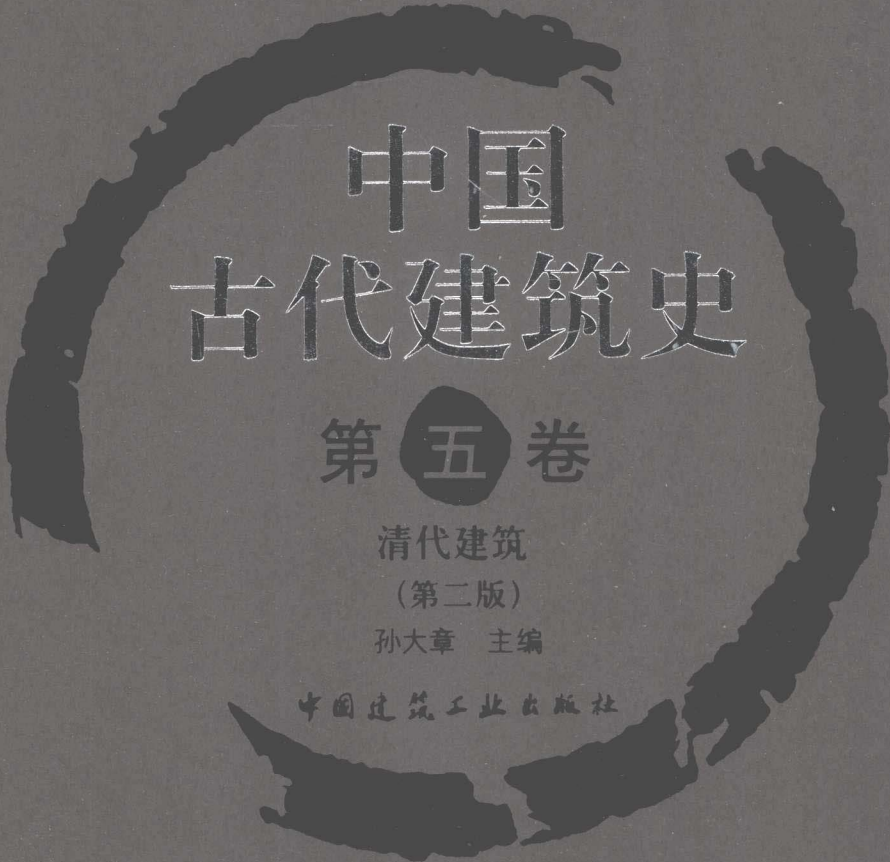




中国 古代建筑史

第 五 卷

清代建筑

(第二版)

孙大章 主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联合资助
建设部科学技术司

中国古代建筑史

第五卷

清代建筑

(第二版)

孙大章 主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建筑史. 第5卷, 清代建筑/孙大章编著.
—2版.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112-09104-1

I. ①中… II. ①孙… III. ①建筑史-中国-清代
IV. ①TU-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8170 号

责任编辑: 王莉慧
整体设计: 冯彝净
版式设计: 王莉慧
责任校对: 王雪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建设部科学技术司

中国古代建筑史

第五卷

清代建筑

(第二版)

孙大章 主编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红光制版公司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16 印张: 35 $\frac{3}{4}$ 字数: 1140 千字

2009 年 12 月第二版 2009 年 12 月第三次印刷

定价: 116.00 元

ISBN 978-7-112-09104-1

(1448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第二版出版说明

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我国传统建筑的研究,肇自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先生。在其引领下,一代学人对我国建筑古代建筑遗存进行了实地测绘和调研,写出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两位开拓者的引领和影响下,近百年来我国建筑史领域的几代学人在中国建筑史研究这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中,不畏艰辛,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0世纪60年代由梁思成与刘敦桢两位先生亲自负责,并由刘敦桢先生担任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这部系统而全面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学术著作,曾八易其稿,久经磨难,直到“文革”结束的1980年代,才得以出版。

本套《中国古代建筑史》(五卷)正是在继承前人研究基础上,按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过程而编写的全面、系统描述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的巨著,按照历史年代顺序编写,分为五卷。各卷作者或在梁思成先生或在刘敦桢先生麾下工作和学习过,且均为当今我国建筑史界有所建树的著名学者。从强大的编写阵容,即可窥见本套书的学术地位。而这套书又系各位学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是一套全面、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的资料性书籍,为建筑史研究人员、建筑学专业师生和相关专业人士学习、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提供了详尽、重要的参考资料。

本套书具有如下特点:

- (1) 书中大量体现了最新的建筑考古研究成果。搜集了丰富的建筑考古资料,并对这些遗迹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与分析,体现了深厚的学术见解。
- (2) 广泛深入地发掘了古代文献,为读者提供了具有深厚学术价值的史料。
- (3) 丛书探索了建筑的内在规律,体现了深湛的建筑史学观点,并增加了以往研究所不太注意的建筑类型,深入描述了建筑技术的发展。
- (4) 对建筑复原进行了深入探索,使一些重要的古代建筑物跃然纸上,让读者对古代建筑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丰富了读者对古代建筑的认知。
- (5) 图片丰富,全套书近5000幅的图片使原本枯燥的建筑史学论述变得生动,大大地拓宽了读者对中国古代建筑的认识视野。

本套书初版于2001~2003年间,这套字数达560余万字的宏篇大著面世后即博得专业读者的好评,并传播到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以及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成为海内外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资料。之后,我社组织有关专家对本套图书又进行了认真审读,更正了书中不妥之处,替换了一些插图,并对全套书重新排版,在装帧和版面设计上更具美感,力求为读者提供一套内容与形式同样优秀的精品图书。

第一版出版说明

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的研究，肇自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他们对散布于中国大地上的许多建筑遗迹、遗物进行了测量绘图，调查研究，发表了不少著作与论文；又于60年代前期，编著成《中国古代建筑史》书稿（刘敦桢主编），后因故搁置，至1980年才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本次编著出版的五卷集《中国古代建筑史》，系继承前述而作。全书按照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过程分为五卷。

第一卷，中国古代建筑的初创、形成与第一次发展高潮，包括原始社会、夏、商、周、秦、汉建筑，东南大学刘叙杰主编。

第二卷，传统建筑继续发展，佛教建筑传入，以及中国古建筑历史第二次发展高潮，包括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傅熹年主编。

第三卷，中国古代建筑进一步规范化、模数化与成熟时期，包括宋、辽、金、西夏建筑，清华大学郭黛姮主编。

第四卷，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第三次发展高潮，元、明时期建筑，东南大学潘谷西主编。

第五卷，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第三次发展高潮之持续与向近代建筑过渡，清代建筑，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孙大章主编。

晚清，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发展的终结时期，接下来的就是近、现代建筑发展的历史了。但古代建筑历史的终结，并不是古典建筑的终结，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遗存有众多的古代建筑实物与古代建筑遗迹。在它们身上凝聚着古代人们的创造与智慧，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宝藏。对此，研究与继承都仍很不足。对古代建筑的研究，对中国古建筑历史的研究，是当今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本书的编著，曾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建设部科技司的资助。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一月

前言

由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建设部科学技术司联合资助研究的“中国建筑史”研究项目，自从1987年开题以来，至今已经八年了，虽然研究过程中遇到不少外界干扰与困难，但总算圆满完成了。这也是继1964年刘敦桢先生领衔主编，全国各单位合作撰写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以后，又一次采用集体合作，分工负责的方式编写中国建筑史的重要活动。作为编者的主观愿望，希望这次编写的稿件质量能有所前进、提高，能更准确地反映历史真实，给读者以有益的启发，但是否能达到这种企盼，尚有待出版后社会各界对此书的评价。

在编写过程中，深深感到历史科学是一项穷毕生精力也不能做到完美无憾的科学。自第一次编史至现在，由于史学界诸位专家的发掘，探索，研究，应该说史料比以前大大丰富，探讨的问题更多更全面，但是愈扩展愈觉得史料之不足，甚至有的方面仍为空白。例如，清代城市的新发展，川甘青地区的藏传佛教建筑，南传佛教建筑，清代工匠事迹，民间祠庙等方面都不够深入；至于书院、文庙、作坊、仓廩、风水、地方性崇拜建筑等则根本没有力量在本卷编写中涉及。这些只能留待同行及后人逐步补充完善了。

根据全书各位主编商定，各卷编写体例仍以建筑类型为主线展开叙述，便于掌握资料，叙述全面，避免遗漏。但是这种体例也有不足之处，即是对历史上综合问题及共性问题的研究则较困难，虽然作者在各章节的叙述中，力求与社会整体发展及相关建筑发展相互联系，以期揭露建筑变化的根本因素，但因体例的局限，其论述仍嫌薄弱。另外，有关本卷的编写内容尚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虽然中国古代史以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作为时代的终结，但是建筑的发展并不以政治事件的发生而突然终止和转化，它需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随着社会结构、经济及技术的发展，民众思想的转化，而逐步转为新时期的建筑。因此，本卷叙述为维持建筑现象的完整性，所选取的资料并不完全以1840年为界，如园林、民居、店面、民间祠庙等实例，有许多是清代末期的建筑。另外，有些建筑本身就是在不断改造、续建的过程，如北京紫禁城，颐和园等都是在整个清代陆续建造的实例，一直持续到清末。其二，在中国古代建筑发展中，明清两代是十分密切相关的，有的建筑就是明清两代陆续增建扩建才完成的。如北京紫禁城宫殿、天坛、文庙、牛街清真寺、湟中塔尔寺、呼和浩特席力图召、西安华觉巷清真寺等。为了避免与第四卷（元明建筑）重复，所有明清相续建筑的总体布局与建筑艺术俱在第四卷中叙述，本卷只着重论述该建筑在清代的总平面更动和改建增建的单体建筑，以与上卷相续。

本卷编写过程中得到各方面友人的鼎力支持，才会有今日之成绩。如本卷第七章第一节的藏传佛教建筑中的藏族地区佛教建筑是由本研究所陈耀东研究员友情撰写的；全部照片的印放，半数墨线图的绘制及文字誊写工作是由本所于文洪建筑师完成的；董开瑾同志还为本书复印了大部稿件及图纸；本书选用的插图除本所的资料外，还得到建筑史学界许多友人的支持，允诺引用已发表的图版。当此书即将付梓之际，谨对上述同志的热情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
建筑历史研究所
孙大章
1995年11月

目 录

第一章 清代建筑发展概述	1
第一节 社会背景	1
第二节 建筑概况	3
一、恢复时期	3
二、极盛时期	4
三、衰颓时期	6
第二章 城市及集镇建设	9
第一节 城市建设的一般特色	9
一、新城市涌现较少	9
二、旧城市改造现象日趋明显	10
三、城市建筑内容构成上的变化	10
四、满城与军屯	12
第二节 清代北京城的改建与扩建	12
一、撤销明代皇城	12
二、调整明代衙署、府第、仓场，改变使用性质	12
三、外城进一步繁荣，商业发达，会馆林立	15
四、宗教建筑中的佛教建筑进一步扩展	15
五、礼制建筑的改造	16
六、开发南苑，使之成为狩猎为主的皇家苑囿	17
七、开发西郊水利，经营皇家园林，形成离宫苑囿群	18
第三节 工商城市及集镇的发展	19
一、工商城市的发展	19
二、集镇居民点	20
第四节 满城	23
第五节 会馆及戏园的兴起	26
一、会馆	26
二、戏台及戏园	30
第六节 民间化的祠庙建筑	33
第三章 宫殿	41
第一节 北京紫禁城宫殿的复建与改建	41
一、清代紫禁城复建过程	41
二、中轴线上外朝及内廷建筑	52
三、乾西五所改建为重华宫	56
四、宁寿宫之改建	58
五、文渊阁及其他建筑的建造	63

六、清代紫禁城宫殿的主要发展变化	65
第二节 盛京宫殿	68
第四章 园林	75
第一节 概述	75
一、恢复期	76
二、鼎盛期	79
三、衰落转化期	82
第二节 北京西苑的改建	84
第三节 三山五园	93
一、畅春园	93
二、圆明园	95
三、静宜园	104
四、静明园	106
五、清漪园	108
第四节 避暑山庄	117
第五节 私家园林	122
一、北方私园	122
二、江南私园	127
三、岭南私园	138
第六节 寺观祠庙园林	141
第七节 造园名匠	151
第八节 小结	153
一、规模庞大而普及	154
二、南北风格的交融	154
三、造园风格大转变	154
四、技胜于艺，实践虽多，但缺乏理论性的总结	155
五、初步开始中西方园林艺术间的介绍	155
第五章 各地民居	160
第一节 清代的社會背景与民居的新发展	160
一、清代民族文化交流首先表现为兄弟民族对汉族文化的吸收	161
二、清代人口增长迅猛，迫使民居设计寻求节约用地的新途径	162
三、商品经济在民居中的影响逐步具体化	164
四、工艺美术技艺与民居建筑的结合	165
五、居民迁移活动促进了民居形制的交流	166
六、木材危机刺激民居建筑寻求新材料及新技术	166
第二节 庭院式民居	167
一、合院式民居	170
二、厅井式民居	182
三、组群式民居	197

第三节 干阑式民居	204
第四节 窑洞与毡房	214
第五节 藏族“碉房”与维族“阿以旺”民居	220
第六节 其他类型民居	231
第七节 清代民居建筑设计成就及历史地位	235
一、建筑设计成就评述	235
二、清代民居在建筑史学上的地位	242
第六章 陵墓	251
第一节 皇陵建置及布局	251
第二节 皇陵规制及地宫结构	264
第三节 皇陵的建筑艺术	271
一、环境景观及风水设计 ^[14]	271
二、建筑轴线的组织	273
三、建筑形体	274
四、建筑装饰	275
第四节 亲王贵族墓及品官墓	276
第七章 宗教建筑	281
第一节 藏传佛教建筑	281
一、清代藏传佛教及其建筑的发展	281
二、藏族地区的藏传佛寺	286
三、蒙族地区的藏传佛寺	300
四、内地的藏传佛寺	305
五、藏传佛教建筑对清代建筑发展的影响	319
第二节 汉传佛教建筑	322
一、清代汉传佛教的衰微	322
二、寺院地方特色逐渐明显	322
三、寺院布局园林化及工程上的进步	326
四、佛教宗派新发展对佛寺建筑的影响	330
第三节 傣族南传佛教建筑	331
一、傣族南传佛教	331
二、傣族佛寺的位置及建筑组成	332
三、傣族佛寺建筑艺术	335
四、傣族佛寺举例	339
第四节 道教宫观	343
一、清代道教历史状况及对宫观建筑的影响	343
二、道教建筑实例	345
三、清代道观建筑设计的新特点	352
第五节 伊斯兰教建筑	355
一、清代伊斯兰教的发展及对建筑的影响	355

二、清代伊斯兰教建筑类型及特点	356
三、著名的伊斯兰教建筑实例	359
四、清代伊斯兰教建筑艺术的两大体系	374
第八章 工程技术	385
第一节 清工部《工程做法》及其他匠作则例	385
一、概述	385
二、学术价值	386
三、本书编制的缺漏	388
四、其他各种匠作则例	389
第二节 官式大木作制度 ^[1]	389
一、平面及屋顶形式	390
二、梁架	390
三、举架	392
四、推山及收山	395
五、斗科与斗口制	395
第三节 官式及北京地区的瓦石构造	399
一、砖石结构	399
二、屋面瓦作	399
三、墙垣及地面	401
四、台基及栏杆	402
第四节 地方大木做法	403
一、穿斗式构架	403
二、苏南营造做法	404
三、闽南木构做法	409
四、藏族碉房	410
五、井干构架	412
六、彝族拱架	413
七、其他结构形制	413
第五节 清代大木设计的发展变化及技术成就	416
一、大木结构的发展变化	416
二、拼合梁柱	417
三、多层楼阁结构	417
四、大体量的建筑	422
五、承重墙及附崖	424
第六节 样房、算房及烫样制作	425
第九章 建筑艺术	431
第一节 清代建筑艺术总述	431
一、群体布局	431
二、单体造型	435

三、建筑装饰艺术	439
第二节 建筑彩画及油饰	441
一、宫廷彩画三大类别的形成	441
二、风采各异的地方彩画	448
三、清代彩画的发展及艺术成就	451
四、油饰技术	454
第三节 木、砖、石三雕及灰塑、石膏装饰	454
一、木雕	454
二、砖雕	457
三、石雕	459
四、彩描、灰塑与嵌瓷	460
五、石膏花饰	460
六、清代建筑雕刻艺术的极盛及衰颓	462
第四节 内外檐木装修	463
一、门	463
二、窗	468
三、隔断	469
四、藻井及天花	474
五、清代建筑装修的艺术特色	476
第五节 建筑琉璃	478
一、清代琉璃艺术的发展	478
二、清代琉璃工艺	480
三、地方琉璃	483
第六节 装裱与鎏金	483
第七节 园林建筑装饰	484
一、漏窗	485
二、月洞与地穴	486
三、铺地	487
四、花墙	489
第八节 家具、陈设、匾联及小品	489
一、家具	489
二、陈设	494
三、匾联	498
四、小品	500
第九节 店面、招牌、幌子	501
第十节 建筑装饰图案设计	505
一、建筑装饰图案构图	505
二、吉祥图案	507
第十一节 《造像量度经》与佛作	509

第十章 结语	515
第一节 清代建筑是中国建筑史发展的重要阶段	515
第二节 清代建筑是对明代建筑高潮的充实与完善	515
第三节 清代建筑发展具有巨大的历史成就	516
一、多民族建筑艺术的综合	516
二、江南建筑技艺的北移	517
三、建筑群体艺术的深化	517
四、环境艺术的开拓	518
五、建筑装饰艺术的工艺品化	518
六、简化木构构造，发展整体式构架	518
第四节 清代若干建筑历史问题的思考	519
一、关于建筑装饰问题	519
二、关于清代的建筑技术成就问题	520
三、关于清代园林生活化问题	521
第五节 清代建筑的时代危机	522
附录 清代建筑大事年表	524
插图目录	532

第一章 清代建筑发展概述

第一节 社会背景

清代是以少数民族统治人数众多的汉族及广大地域的一个历史时期；是版图扩展，人口急剧增加的历史时期；也是封建经济经历了最后的繁荣，然后走向瓦解，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发展的历史时期。清代社会历史特点对清代的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里也包括了建筑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其规模、数量、技术、艺术风格诸方面。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在山海关石河口被清兵击败以后，放弃北京，西走西安。五月睿亲王多尔衮率军入京，十月清世祖福临即皇帝位，建元为顺治元年。历经十帝，至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清帝逊位为止，共计统治中国268年。若以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步入近代历史为界范，则清代所历经的古代社会的时间不过197年。但这近二百年间的历史变化及建筑事业的演进是十分巨大的，而且极富特色，是了解中国古代演变为近代历史的重要环节，而且遗存的建筑实物众多，内容丰富，可视性强，亦是研究建筑物质文化发展史必不可少的资料。可以说，今天人们心目中的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形象，大部分是从清代建筑中获得的。

清朝统治阶级核心是崛起于东北建州卫的满族，即明代的女真族。传至努尔哈赤时代统一了女真各部落，形成强大的军事集团。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式建国称帝，国号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与明朝相对抗。传至其子皇太极时，又改国号为清，族名改为满洲。满族的统治和扩展基于其军事力量，采用兵民合一，全民皆兵的制度，即“八旗制度”。这种制度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1]，“出则备战，入则务农”。将所辖人民编为八旗，各立旗色，分为黄、白、红、蓝，正、镶各四旗，称为满洲八旗；后又将归附的蒙古族、汉族人编入，另设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按规定每三丁抽一从军，军备由旗人供给，军令政令皆统一于旗主手中。清军入关定鼎中原，按当时满洲八旗的建制推算，当时满族不过六十万人^[2]，以此力量统治中原数千万汉族及各族人民决非易事，故清代统治阶级实行了一系列有特色的军事、政治、经济政策。

在军事上为巩固八旗体制，入关后曾在京畿地区圈占土地分给八旗兵士作为份地，并发给带甲士兵月饷，分配住房，增加了国家对八旗官兵的供应，旗民成为享受特殊待遇的居民。同时将归降的汉兵编为绿营兵，协同作战，在消灭江南明代政权及平定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三藩之乱中起了很大作用。八旗兵除拱卫京师以外，还分驻全国冲要城市中，包括江宁、杭州、福州、西安、荆州、成都、归化等十三处。在这些城中划定特区，建造满城，设将军府以总督地区军事活动，以少制多。当然八旗制度在后来走向其反面，旗民仰赖世袭供应，坐吃皇粮，游手好闲，训练松懈，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在清代末期的战争中，完全依靠汉人地方武装——团练来应付局

面，八旗军的军事作用全无，至此，清朝统治也走向了崩溃边缘，这是当初始料不及的。清初由于军事政策的正确，经顺治、康熙两朝即迅速消灭了南明政权，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从政权更迭的军事行动来看应该说较为顺利，中原城乡的军事破坏范围也较小，对恢复生产有利。乾隆时期用兵西北，击败准噶尔部和南疆回部，平定大小金川，驻兵西藏，军事活动皆在边陲之地，对中原影响不大。

清代在政治上大力吸收汉族制度，任用汉人为官，参加行政管理，中央政府各部、司分设满汉大臣，标榜“满汉一体”，当然实权皆握在满洲贵族手中。行政管理方面维持明代的行政区划，建立直隶及行省，每省设巡抚、布政、按察、学政、道台等官职，使行政体制迅速运转。选举方面依然实行科举制度。顺治二年即开科取士，康熙十七年又开博学宏词科，为青老士子广辟进身之阶，使清政权很快得到地主士绅的支持。从建筑上来看，京师紫禁城仍然沿用明城，依原规划制度加以恢复。京城内广建王府。地方上的府、州、县的治城皆依明旧不变，另建新城的实例很少。城市布局也多沿明城之旧，仅局部改造，衙署、仓场等充分利用旧屋，连许多满城也是依附旧城而建。汉族建筑艺术风格及技术工艺仍然传承下来，并对满蒙贵族高级建筑产生巨大影响。

经济上大力恢复农业生产，免除明代末年所增的一切苛捐杂税，皆按亩征收租税，有些遭受战乱的地方还减收若干。清初并规定“丁随地派”的制度，即原按劳动人口（丁数）摊派的徭役，折价摊入地亩田赋之中，农民可免受差徭之困扰，而地主大量兼并土地的趋势也有所收敛，使大量自耕农得以维持下去。同时清政府大力提倡垦荒与屯田，耕地面积有所扩大，使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并有所增长。清政府在商税方面亦较宽松，有助于物品运转流通，至乾隆时期社会经济实力大增。经济增长导致官私建筑数量大增，民间有余力追求高质量的享受型建筑及礼仪性、宗教性建筑，如厅堂、楼阁、园林、戏馆、寺观、祠庙等都发展很快。商业的发展也带动了会馆、行会、作坊、典当、票号等类型建筑的产生与发展。

在文化上除了推行科举制度，以笼络知识阶层以外，还大力推行宗教信仰，特别是藏传佛教在元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兴盛起来。有清一代敕建藏传寺庙众多。政府还在职官中设置僧录司、道录司，府道衙署内设僧纲司、道纪司，由政府参与管理宗教事宜^[3]。藏传佛教特别对徕远西藏、怀柔蒙古具有特殊的意义^[4]。西藏达赖五世早就与清廷有来往，顺治二年还受到册封，后来依附准噶尔的噶尔丹对抗清廷，关系一度恶化。清政府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派兵入藏，立噶桑嘉措为达赖六世（后称七世）。雍正三年（1725年）又派驻藏大臣，协同达赖、班禅办理西藏事务，并主持金瓶掣签确定达赖及各地活佛转世的制度^[5]，有效地控制了西藏的政教权力。蒙古各部族早就内附，在清廷理藩院中，设旗籍、王会、典属等清吏司，掌内外蒙古各旗的朝会、封爵、绥抚之事，并在蒙族地区推行藏传佛教，康熙时代敕封内蒙古的章嘉呼图克图及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转世活佛，总统内外蒙古宗教事务。为了表示政府对宗教的支持，在蒙古地区广建寺院。自康熙时在多伦建汇宗寺开始，续建善因寺、庆宁寺，以及五当召、席力图召、大召、贝子庙，最多时达到1000余处。另外藏青川甘地区的藏族寺院亦得到发展，如著名的黄教六大寺院皆有重大的扩建与改建，其中甘肃拉卜楞寺则完全是清代兴建的。同时中原地区的五台山、承德、北京亦修建出一批汉、藏式藏传寺庙，并以北京城内的雍和宫为藏传寺院的管理中心。据康熙六年统计，全国敕建大寺庙达6073处，其中绝大多数为藏传寺院^[6]。

清代在文化上另一举措是尊孔读经，宣扬程朱理学，同时并对关羽的忠义行为大加褒扬，所以清代的孔庙及关帝庙十分兴盛，遍布全国城乡。此时又对全国的礼制建筑加以整顿，形成完整的以天、地、日、月、自然神祇及宗庙、祠堂的人文鬼神为主题的祭祀系列。

当然清初大兴文字狱,实行海禁,维护满族特权等措施对当时的生产有一定的不利影响,但总的来说,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稳定,并逐步上升。

乾隆时期生产恢复已达高潮,人口迅增,加之版图扩大,拓地千里,此时社会产生新的问题,主要反映在屯田、工商业及民风诸方面。迅增的人口多集中在京畿及江南一带,分布极不平衡,因此政府多次移民晋北、甘青、四川等地。平定新疆准部以后,又在伊犁、迪化(乌鲁木齐)一带建城实行军屯,携眷定居垦荒,屯田达30余万亩。另外为开发沿海滩涂荒地,制定了奖励垦植政策,使劳动力分布有了一定调整。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使全国的建筑技艺得到了交流、融会与提高。如川南建筑带有两湖风格,内蒙部分地区受晋陕建筑影响明显。生产的发展带动工商业的兴旺,出现了一批富商巨贾,特别是盐商、票号更是清代商业中独有的特色行业。此外窑业、铸钱、纺织、井盐、印刷等工业项目亦十分发达。经济的繁荣及财富相对集中也使民风逐渐向奢靡享乐方面发展^[7],从皇帝、八旗贵族到中小地主、富商巨子、皆追求锦衣玉食、楼台馆舍的生活享受,所以这时的园林建筑、日常工艺用品都十分精致。帝室经营北京西郊园林及热河避暑山庄,官僚地主广建私园,这些宫廷建筑、园林建筑及官邸大宅中的内外檐装修质量皆有突出的提高,讲求审美观赏艺术价值。如苏州地主宅院一座砖刻门楼,动辄使用二千余工。扬州为恭迎乾隆南巡,盛饰城市园林,自天宁门至平山堂,沿瘦西湖一路行来,十里楼台衔接,笙歌不断^[8]。当时宫廷建筑装修、家具、陈设皆由内务府造办处承办,处内集聚各行能工巧匠,此外还特别令江宁、苏州、广州等地织造署特旨承应贡品,说明当时官私建筑的奢侈程度。但从另一方面讲,清代中期也是中国传统建筑装饰艺术的大发展大创新时期,为古代建筑增添了异彩。

嘉庆以后清朝政治腐败,政局动荡,国内农民起义不断。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清廷失败而告终。闭关自守的封建王朝被打开大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中国,中国开始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朝统治者,在内部农民战争,外部帝国主义侵略以及统治阶级日益腐败的状况下,走向崩溃。从建筑上讲,因循守旧、修补维持、崇慕洋风、华靡繁琐是 its 特点,清朝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规模庞大,气势辉煌,蓬勃向上的建筑景象了。

第二节 建筑概况

依据清代建筑的恢复、极盛、衰颓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一、恢复时期

约为顺治初年至雍正朝,当时国内初定,国力不裕,清初三代皇帝在建造方面皆极为节俭,以实用为主。例如恢复明代北京宫殿方面,仅将坐朝理政、后妃居住的前三殿、后二宫及东西六宫、天安门、午门等处恢复,其他嫔妃、皇子居住的宫室及宗教、宴游的建筑皆未复建,紫禁城仅可说是初具规模。北京城中大量建造王府亦是巩固政权的需要。清代与明代不同,同姓王、异姓王皆不分封外地,而在京城中集中建府居住,即所谓“建国之制不可行,分封之制不可废”,仅有封号而无领土,帝辇之下集中管理^[9]。清初封亲王、郡王的共有六十人,但因早卒、战死、无后等原因实际在京城建府的并不足此数。此外还有不少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次等封爵的府第。至乾隆时有封爵的王公有四十七人,府第四十二处,至嘉庆时增至九十二处^[10],如此集中的王府建筑群是历代帝京所不曾有过的。北京内城改为满城,驻防八旗官兵亦是京城一大变化。由于供应旗民口粮的增加^[11],故京师、通县张家湾一带皆增加了仓场^[12]。促进北京变化最大的是

外城的繁荣，汉民官商尽迁外城，使前门外、崇文门外、宣武门外一带迅速繁荣起来，大宅、会馆、客栈，鳞次栉比，形成前门商业大街、琉璃厂文化街、宣外会馆街等。

此时期的园林建造亦有所恢复，顺治时在北海建永安寺及白塔，开辟了南苑，康熙年间改建了西苑的南台，建造了勤政殿、涵元殿、丰泽园等建筑，正式形成北海、中海、南海三海联并的新西苑格局。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在西郊建畅春园，四十二年（1703年）在热河建造避暑山庄，成为清廷最大的离宫，奠定了清代宫廷苑囿发展的基础。清初的园林有两个特点：一是建筑装修简素，追求自然风趣；二是多数苑囿修建皆有一定政治目的。例如南苑建造是为了行围、狩猎、大阅官兵，以不忘操练武备之重要性；整修北海白塔山，建立号炮、旗纛，是为了巡城防变，警戒京师之用意；修整畅春园是为了供养皇太后；建造避暑山庄是为了木兰秋狝^[13]，练兵习武，警备北方外族的侵扰，兼有第二政治中心的设想。

宗教建筑方面，虽然顺治、雍正皆对汉传佛教有深入的了解与信仰，但是占据宗教界统治地位的仍是藏传佛教。早在入关前，于崇德七年（1642年）西藏的达赖、班禅即派遣使者到盛京与皇太极联系，相互支持。清帝也在盛京四座城门外建造了四座喇嘛塔^[14]，“象征统一”。入关以后，在北京建北海永安寺，顺治九年（1652年）建西黄寺以迎接五世达赖，作为他人京驻锡之所。康熙三十年（1691年）在内蒙多伦建汇宗寺。四十八年（1709年）甘肃夏河的拉卜楞寺开始建造。五十二年（1713年）在承德建溥仁寺、溥善寺。雍正时在多伦又建善因寺，在库伦建庆宁寺，在打箭炉建惠远庙，在北京建嵩祝院。顺治、康熙两帝皆曾朝礼山西五台山，将其中十座寺院改为藏传佛教寺院，称为黄寺。至此初步奠定了内地北京、承德、五台山三处藏传佛寺中心地位。

清代陵寝建造方面亦遵循明陵制度，采取集中陵区的方式，形成规模庞大的气势。清初三陵（永陵、福陵、昭陵）在关外，为清帝爱新觉罗氏的祖陵。顺治进关后于十三年（1656年）选定河北遵化马兰峪为清陵兆域（俗称清东陵）。继之雍正八年（1730年）又选定河北易县永宁山为万年吉地（俗称清西陵）。这两处的陵域选址皆为山环水绕，风景绝佳之处，反映出风水堪舆理论在建筑环境学方面的成就。

礼制建筑方面基本沿用明代的各坛庙，仅在雍正六年至七年间（1728~1729年）增设风神、云师、雷师之庙，使自然神祇坛庙系列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广建各地文庙及关帝庙。顺治元年（1644年）就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大帝”，康熙年间又在关羽家乡山西解州按帝王规制复建成全国最大的关帝庙。雍正二年（1724年）曲阜孔庙大火，全庙被毁，清廷出国帑恢复了全部建筑，并将大成殿、大成门原来的绿色琉璃瓦改为黄色琉璃瓦。说明清代统治者利用儒家的礼教精神与关羽的忠义气节为其思想教化服务的政治目的。

雍正时期内政趋于平稳，朝廷在整顿吏治的同时又着手建立一系列规章制度。在建筑方面较突出的事例是雍正十二年（1734年）颁布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将当时通行的27种建筑类型的基本构件作法、功限、料例逐一开列出来，目的是统一房屋营造标准，加强宫廷内外的工程管理。《工程做法》一书基本上是明末清初北方官式建筑技术与艺术的总结，反映了当时的建筑水平，同时此书也为下一步乾隆时期的建筑大发展准备了技术条件。

二、极盛时期

约为乾隆时代。当时全国上下、宫廷内外大兴土木，一大批质量上乘，规模宏巨的建筑产生了。这是封建社会最后一次建筑发展高潮，在艺术上形成突出的时代风格，有的专家认为，若要探寻清代建筑的艺术风格，应以乾隆时期为代表，亦可称之为乾隆风格。

乾隆时期建筑大发展是有其经济基础的。当时耕地面积已由清初的500余万顷,增至800余万顷。人口接近三亿大关(中国历代皆未超出过一亿人口,均在五六千万人之间徘徊)。政府仓储四千五百万石,而清初每年仅有六百万石存粮。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统计户部库存银两达七千八百余万两与顺治时入不敷出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了。故当时称“是为国藏之极盛”^[15]。

乾隆时期的建筑活动涉及各个方面,乾隆即位最初的十年,营缮范围多在北京宫城内外,如修缮太庙、孔庙、雍和宫;改建紫禁城内的乾西五所,将其建为重华宫、迎春阁、西花园,成为一组居住、听政、游宴的建筑;确定圆明园四十景;乾隆十年(1745年)开始营建圆明园东的长春园及香山静宜园等。此后,建筑工程量大增,十一年(1746年)建北海阐福寺,十三年(1748年)扩建西郊碧云寺,增建中路金刚宝座塔,十四年(1749年)改建天坛圜丘坛,使其建筑艺术面貌大为改观,十五年(1750年)扩建玉泉山静明园,同年开始结合北京西郊水利开发建造万寿山清漪园。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开始先后六次南巡江南^[16],将江南名园胜景绘图写仿在北京西郊园林中,大大提高了皇家苑囿的艺术质量。康熙南巡大部分目的是考察河工,巡视吏治、民情,而乾隆南巡则完全是为了游宴观赏名山胜景,陶情自娱。十六年(1751年)开始大规模扩建热河避暑山庄,历时40年,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完工,完成了三字命题的三十六景,以与康熙三十六景相对应。十九年(1754年)还在山庄万树园内大宴五日,接见新归附的扈尔伯特蒙古三策凌。同年还建成河北盘山“静寄山庄”行宫。可以说,皇家离宫园苑的建造全面铺开,全国上下一片升平之象。二十年(1755年)又进一步改造北海东岸,建画舫斋,濠濮涧一组建筑,使北海四面成景,改变了明代西苑琼岛孤立的景象。从二十年(1755年)起至四十五年(1780年)止的25年间,在承德避暑山庄东面、北面山坡上,相继修建了普宁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庙、殊像寺、罗汉堂、须弥福寿庙等寺庙。结合康熙时建的溥仁、溥善寺,合称外八庙,成为京外的又一藏传佛教中心。这些寺庙的建造皆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如纪念击败准部,统一天山南北;庆祝达什达瓦部族内迁;或欢迎班禅内觐;或为乾隆六十寿辰接待各民族王公贵族而建,故这些建筑皆有模仿各地民族建筑的特点,对各民族建筑间的技术交流汇合产生积极影响。此时期还命天主教传教士蒋友仁、郎世宁等人在长春园北建造一区欧式宫殿及西洋水法(喷泉),建造了清漪园万寿山巅的三层佛香阁,北海北岸的小西天观音殿,增辟圆明园绮春园(后改万春园),至此圆明园三园规模已完全形成。三十七年(1772年)又将康熙时建成的紫禁城东路宁寿宫重建,加大规模,增加内容,提高建筑装修质量,形成皇极殿、宁寿宫、养性殿、乐寿堂中路建筑的前朝后寝規制,东路畅音阁戏台及佛堂,西路宁寿宫花园。整个宁寿宫自成格局,乾隆皇帝准备作为归政后颐养之所。宁寿宫的建造是清代对紫禁城规划的重大改造。三十九年(1774年)以后,因编纂收藏《四库全书》的需要在北京、热河、盛京、杭州、镇江、扬州共修建文渊阁等七座藏书楼,俗称“清代七阁”。四十三年(1778年)建盛京天坛、地坛,四十七年(1782年)建香山静宜园大昭庙,四十八年(1783年)建盛京宫殿内的戏台、斋堂等建筑。乾隆五十年(1785年)以后建筑活动明显减少,因其年逾古稀,游观之兴已减,所以敕建土木工程也就随着减少^[17]。

乾隆时期全国各地的土木建筑亦有巨大的发展。如私家园林修建的热潮,迅速遍及江南地区,以苏州、杭州、扬州为盛,尤其是扬州因盐商丛集,享乐之风蔓延,又借乾隆南巡之机,故城西瘦西湖至平山堂一带,私园相衔,相互渗透,而且皆向水面敞开,终日湖中画舫鱼贯,笙歌不断,湖光映色,楼台含情,从园林环境艺术上讲,可称达封建社会之顶峰。

乾隆时期的宗教建筑除上述敕建的大批藏传佛教寺院外,尚有西黄寺为班禅六世所建的清淨